

中国人情

系列读本

中国人

Chinese
Concept and Act



观念与行为

现代始终能在传统中找到端倪，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也如此——三千年沧海桑田里有演变，更有传承；而观念和行为二者内在的冲突及呈现的困境，是历久不变的探讨核心。

文崇一 萧新煌 主编

Series

On

Chinese

Social

Relation

中国人情
系列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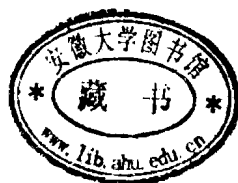
中国 人

Chinese
Concept and Act

观念与行为



文萃 萧新煌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 文崇一, 萧新煌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1

(中国人情系列读本)

ISBN 978-7-300-16550-9

I. ①中… II. ①文… ②萧…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093 号

本书由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文崇一 萧新煌 主编

Zhongguoren Guannian yu Xingwe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4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2 00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1	绪言 文崇一 萧新煌
1	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 杨国枢
3	人与自然的关系
6	人与他人的关系
10	人与自己的关系
14	中国人的富贵与命运 文崇一
15	努力向上
18	道德很重要
20	关系取向
23	缘与报
26	命运捉弄人
28	结束的话
30	中国人的人情关系 黄光国
30	引言
32	人情之国与差序格局
35	人情及人情法则
38	人情的困境
40	人情与面子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41	搞关系、走后门
44	社会架构与人情文化
49	结论
51	中国人的道德思考 韦政通
51	道德思考的问题
55	破坏伦理道德的因素
58	道德教育的困境
62	道德观念的改进
66	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胡佛
66	政治生活的意义
68	传统政治生活的轨迹
75	现代政治生活的转型
83	结论：朝向现代
84	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 李亦园
84	前言
85	中国家庭的特色
90	中国家庭的现代适应
93	中国家庭与中国文化
96	结语

98	中国人的家族与企业经营 陈其南
98	传统中国家族制度的特质
100	家族企业体的延续与分裂
102	财产与企业的继承法则
105	企业体内的人际关系与一体感
107	近代西方企业体与家族制度
109	结论
110	中国人的城乡经验 章英华
111	私属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冲突
113	便利、热闹与安谧之间
116	主观判断强的行人
119	欠缺对待陌生人之道
121	难以建立的地缘意识
124	结语
125	中国人对环境的关切 萧新煌
125	前言
127	对环境的认知
129	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关切
140	环境知识与环保认识
144	结语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146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瞿海源
146	宗教信仰的意义
150	民间信仰盛行
154	民间信仰的功利性
158	新兴的宗教信仰
162	佛教与西方宗教
165	结语
167	中国人的病与补 李丰
168	人体像机器
168	环境和职业病
173	无形的环境污染
174	进补的观念
178	进补的偏差
183	运动是调适的正确方法
184	中国女性的婚姻与职业 伊庆春
184	前言——柔与刚的相对性
190	择偶的过程
193	婚姻关系
198	家庭事业兼顾
201	结语

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

杨国枢

所谓文化，是一个团体或一组人，经过长久的生活之后，为了适应环境中的种种问题，慢慢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以及为了表达这些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所制作出来的种种成品，如文学、艺术、建筑、器具、典章及制度等。就这个定义来看，文化应该包含几个层面的意义。

我们可先把文化分为两类，一是物质文化，一是非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以物质性的材料所制成的特殊而固定的形体或架构，以表达某种思想与意念，或发挥某种用途；如建筑、农具、服饰、舟车、武器等，都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以外，一切可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方式所表达的集体性的思想、观念及行为，都可统称为非物质文化。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又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虽然具备非物质的内涵，却可用物质性的媒介完成其表达，而且在完成之后，又能在生活里延续下去，如文学、艺术、典章及制度等。这一层面的非物质文化，可以称为“完成文化”。其二是指一个团体、国家或种族所共同具有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及行为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多属内隐的文化内涵，可以从人们的言行中推论而知，但却不能以特定的外显形式充分加以表现。这一类的非物质文化，我

们称为“主观文化”(subjective culture)。所以,总括说来,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类,非物质文化又可再分为完成文化和主观文化两种。

许多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很狭隘,一谈到文化就想到物质文化,仅只着力于研究某个国家的房屋式样,或某个朝代的陶瓷器物等。当然,专门研究古代文化者,因为古人已经不存在了,便不得不强调物质文化,并以物质文化为研究考证的主要依据。

很多当代的研究者所谓比较进步的文化观念,也不过是在物质文化之外,再加上非物质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典章及制度等所谓的“完成文化”罢了。但是仅只如此,还是无法涵盖整个文化的范围。因为一切“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的制作,都是为了表达“主观文化”的内涵,因此“主观文化”才是整个文化的精华所在。

譬如说“文如其人”,即意谓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会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这个作品可能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著述,可能是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又譬如说,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种形状的房屋,而不建造那种形状的房屋;房间为什么要这样布置,而不那样布置。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人所归属的社会中共同而有力的思想和观念。因此,真正探究起来,主观文化才是居于文化的主导地位。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提及文化时,常常指涉其他两类文化,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主观文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过去的文化科学并不发达,谈文化的人几乎都是采取历史取向的,他们研究的多半是古人的文化,而古人的思想、观念、态度、行为无从直接考证,所以过去国人对于文化的研究仅限于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但身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务必要开阔自己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许多专门研究文化的社会科学学者,更应该具备这样的观念。因为,唯有了解了中国人的主观文化,亦即中国人共同的思想、态度、观念及行为,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文学、艺术、器物、制度)的精髓。

谈中国人的主观文化,也就是要谈中国人共有的一些重要的基

本的性格态度、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但是，这些主题既广又深，此处我想就一个别人较少谈及的方面来讲，那就是从生活的观点出发，谈谈中国人的一些主观文化内涵。

人生在世，存在着几种重要的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再一种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另一种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还有就是人与时间、人与空间的关系。我想就前面三种关系来谈一谈。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采取怎样的态度、看法或观念？这些态度、看法或观念表现在行为上，又发挥了哪些功能？我们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就会联想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展现的是人跟自然“打成一片”的境界，如果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就是人跟自然同属一个系统的两部分，两者组成一个难以分割的生态单位。但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含有相当的哲学意味，必须受过相当的教育，且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下，才能真正接纳这样的观念。一般非属知识分子的中国人，持有的却是另一套想法，那就是顺乎自然，或臣服于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但包括外在的大环境，甚至也包括超乎自然的范畴。

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好几种，我们前面谈到的只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中国传统以来对于人跟自然的关系，崇尚的主流思想就是天人合一。这个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学统”上一脉相承的观念，我们可用两个现代的概念来解释，一是“融化”的概念，一是“外化”的概念。

从“融化”的观点来看，所谓天人合一，也许就是人融入自然而不突出，中国的国画常常就表达了这样的境界。中国的山水画里，人物与背景的对比总是不明显，似乎主题是山川大河的灵秀或磅礴，而人物只是浅浅勾勒几笔，作为陪衬。这就是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的投射。

至于“外化”，就是英文的 externalization 之意。所谓人外化于自然，就是把人比作自然的一部分。举例来说，中国人常把人生比作蜉蝣、流星、落叶或夕阳等各种外在的东西，借以抒发内心的某种无力感或卑微感。尤其是诗人，喜欢把自己比拟为孤舟、扁舟、小舟或虚舟等。我们可以从很多诗里，看出中国人外化于自然的心态，例如陆游有首诗：

吾生如虚舟，万里常泛泛。
终年厌作客，著处思系缆。
道边何人居，花竹颇闲淡。
门庭净如拭，窗几光可鉴。
堂上满架书，朱黄方点勘。
把茅容卜邻，老死更谁憾。

把人比拟为外物，我们可以从陆游这首诗看得很清楚。其实，在中国诗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位专攻文学的女士，叫做 Eugene Eoyang，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她发现中国诗人在寄情于自然，或有感而发地描述自然时，常把自己的形象比为各种舟，好像“我”就似舟一般的孤独、不稳定、微不足道、摇摇荡荡、没有什么目标。他们喜欢把自己比为一种外物，把外物的特性加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一种“外化”的现象。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外化，西方人却似有不同的倾向。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喜欢把人比作外物，比作自然，或把自己当做自然的一部分。例如，希腊人喜欢把自然赋以人的特性，即把自然“人化”，我们称此为 personification。他们将人的特点，加诸各种外物及自然之上，起了一种拟人化的作用，觉得万物皆有情，这也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作用(projection)。所谓“投射作用”，就是个人把内心的情绪或感受投射到外物之上。譬如说，当人心情好的时候，就觉得鸟语花香，好像鸟也特别快乐，花也特别芬芳，太阳也比平时更亮了些；反

之,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则会感到天昏地暗,仿佛天地与我同哀。其实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鸟还是原来的鸟,物还是原来的物。

这种人化或拟人化的观点所造成的影响,自然跟中国人外化的结果大异其趣。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以外在环境及外物为主,人在万物中也只是其中之一。西方人以人为万物的中心,环境或外物皆为辅。这两种迥然有异的观念,造成中西两方在伦理、道德及文化发展方向上的重大差别。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不过,真正能够理解和接受这种观念的,只限于在广大群众中占少数的知识分子;一般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最多只是间接地受点熏陶,对于自然跟人的关系,恐怕还是抱持着人应顺服自然的看法。在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中,虽然人还是比自然小了一点,基本上却是站在还算平等的地位。但在人顺服于自然的关系里,人跟自然所立的水平就有高低之分,甚至两者好像并不属于同一系统,而是一个小系统臣服于一个大系统。弗洛伊德认为,人在适应环境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一是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中国人就是属于前者。举例来说,“愚公移山”故事中的愚公,被中国人认为是一个愚笨的代表,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变动环境,似乎环境一变,就全然失去了章法与秩序。中国人的风水观念也与此有关。风水不能破坏,只能迁就。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国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这么困难,当年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却那么容易?其中的道理,可能就在佛教文化刚好与中国文化中既有的观念不谋而合。以适应环境而言,佛教基本上也是强调改变自己去迁就环境,和西方人的观念是不同的。

但是,现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法已经和古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天人合一”,以及一般平民百姓所抱持的人应顺服自然的观念大有不同了。这种改变的推定,并不是依据文献记载所下的结论,而是根据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主观文化所做的研究,以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改变方向。现代中国人对于人跟自然的关系,已

由过去的人跟自然应合而为一，或人应屈服于自然的态度，转变为人要克服自然、运用自然，从而成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现代人生观。

人与他人的关系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的性格非常强。易言之，中国人相当重视外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现实，并且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常常为了符合社会情境的特征与要求，违背自己的原意，表现出适合那个情境的反应，以迎合外界。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专门从事中国人、印度人及美国人的比较研究，他提出一个与“社会取向”类似的观念，即“情境中心”(situation - centeredness)，强调中国人随情境而改变或决定其行为的倾向。当然，“社会取向”中所谓的“社会”，其范围要比“情境中心”里的“情境”为广。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强调人际或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宁可牺牲个人的许多利益，来努力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起码要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关系。例如，在传统的大家庭里，个人的地位非常渺小，必须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去做许多应该做但却不一定乐意做的事情。大家都很重视自己和他人的和谐关系，以及整个家族的和谐状态，但却因此常与个人的兴趣及利益相冲突。所以，这类和谐关系当仅止于表面，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埋怨，甚至潜伏了极端的的不和谐。

第二，重视别人的意见或批评。中国人对他人的、家庭的或社会的意见和评价，看得比个人的好恶和评价还重。这显示了中国人不重视个人自身对事物之看法和意见的社会取向。

第三，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俗语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外在情境一旦改变，个人的因应态度与行为也必须加以配合，以使自己的言行能时时具有社会的适应性，并能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自己在言行上的先后一致性并不必要，统一的主张也不会重视；能识时务，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维持外表和谐得体的人际关系，才是社会

生活的重点所在。

第四，习于压抑自我以求和谐。中国人因特别重视表面社会关系的和谐，便格外讲求压抑自己。最好少活动少说话，不把心中真正的意见表达出来，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压抑作用”(suppression)。在很多场合中，中国人都好像没有反应。殊不知，“不反应”就是中国人最标准的反应。

第五，强调反求诸己而不外责。反求诸己是标准中国人应有的做法。为了维持外界关系的和谐，常常先怪罪自己。

由以上五项特点可知，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主要作用在于应付外界，希望能够维持自己跟别人的良好关系。

接着我想举一些实例来说明，其中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有的是过去文献中的例子，还有的是我们从事实际研究所得的结果。

从日常生活方面来讲，中国人有许多客套、寒暄、应酬语，社会取向强的人甚至还善于说谎，非常老于世故，也非常表面化。又如中国人爱讲吉利话，也是重视社会取向的很好的证明。这些吉利话都是为了应付某种社会情境而发明的，用以维持人际关系的表面和谐。

在文献方面，可以举一个文学上的例子。中国人由于社会取向强烈，经常会为维持社会和谐而牺牲自己的尊严，并压抑自我的感受。这种情形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在诗词文章中尽量少用“我”字。在中国诗里，特别容易发现这种现象。在早期《诗经》的时代，社会取向的中国文化尚未充分形成，文章里常常自发地出现很多有第一人称代名词的文句。汉唐以来，中国文化里社会取向的特质已成，自我之不发达也就彰然可见了。举一首诗为例来说明：

溪居 柳宗元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诗从头至尾没有一个“我”字，但读者却能很清楚地看出来，它是在描述作者自己的生活及心境。如果我们把它译成英文，“我”字就都出来了：

I had so long been troubled by official hat and robe.
That I am glad to be an exile here in this wild south land.
I am a neighbor now of planters and reapers.
I am a guest of the mountains and woods.
I plough in the morning, turning bewray grasses.
And at evening tie my fisher - boat, breaking the quiet stream.
Back and forth I go, scarcely meeting any one.
And sing a long poem and gaze at the blue sky.

(Bynner translation)

我认为这种差异的由来，并非只是语文的不同，因为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楚辞》）里，第一人称代名词也经常出现。换句话说，并不是中国文字里没有第一人称代名词，也不是中文文法里没有这个主词的地位，而是中国人在以文字抒发情感时，表现出一种社会取向的谦虚与自抑。

此外，社会心理学者也曾针对社会取向的心理特质，做过一些实验。例如，我们曾根据测验的结果，将比较现代化的人归为甲组，比较传统化的人归为乙组，来进行一项实验性的研究。在此项研究中，实验者要求每一位受试者做一件很单调很无聊的工作，即将一个盒子中的棋子一颗颗地取出，再一颗颗地放入另一个盒子。这项作业进行二十分钟后，实验者再向这两组人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个实验有没有趣味？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这个实验有没有科学价值？第三个问题是：假如下次再邀请你来做类似的实验，你还来不来？甲组的答复偏向“没有趣味”，“没有价值”，“下次再也不来了”；可是，比较传统化的乙组，却会把明明无趣的说成有趣，明明没有价值的说成有价值，明明下次不会来的说成还会再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可能是因为比较传统化的受试者，不愿因为说实话而

破坏了人际和谐,即使是面对毫无关系的实验者亦是如此。由此可知,社会取向是中国人价值观念中很强烈的一种性格倾向。

在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中,与社会取向密切关联的是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国人的权威性格,表现在人际关系里,就是相当强调上下的关系。换句话说,即是注重依年龄、地位、性别或其他因素将别人做高低的排比;同时,在自己与别人之间也一定要排出个高低,看是你比我高,还是我比你高,才晓得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方式去对待。所以,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里,上下关系的结构比较严谨,而平行关系的结构较为松散。人与人之间不排出个高低,就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去反应。因此,必先定上下而后心安。这是中国人的权威性格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中国人喜欢把地位较高的人权威化;而且,一个人一旦成为权威之后,在下的人就要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巩固上下的关系,便于维系团体内部的和谐,以达到稳定社会的最终目的。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人常把社会习俗权威化。社会习俗提供给大家在什么时间、场合该做什么事的规范;按照习俗行事就容易各就各位,维系社会关系。权威性格强的人会将习俗予以绝对化与权威化,使习俗本身变成一种绝对的权威,一旦有人违反了习俗,就主张予以严厉的惩罚。

第四个特点是把人二分化,即将人分为两类,如好人与坏人、自己人与外人。经过这种简单而绝对的二分之后,就有了该如何对待对方的“依据”。例如,常有人说中国是富有人情味的民族,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大多数情形下,中国人对自己人的确非常有人情味,但对外人却并非如此。到了近代,这种情形又有了改变,大家对外国人也非常有人情味,这可能是由崇洋媚外的心理所造成的。中国人对自己人讲人情的程度,几乎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但对外人则有时候并不太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即使有人在街头或村外从事供奉茶水之类的事,也往往是为了给自己或后代积善而做。

大部分中国人对外人最直接而自然的反应是怀疑。

以心理学来分析,这种怀疑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人长久生活在自己人所组成的家族之中,其内部往往偏重于家族利益及家族关系的维持,而个人的欲望与需求则常难获得适当的满足,甚至会受到许多委屈、挫折或压制,结果很容易产生一种累积性的敌意。但这种敌意却不容许对自己人发泄,于是常以自己人以外的“外人”为对象而投射出去,觉得外人对我们都是有敌意的。这种敌意普遍增强到某一强度,就可能造成这家(或村)和那家(或村)之间的武力冲突,我们称之为“械斗”。械斗通常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却时常打得头破血流,而且每隔几年就要斗一次。械斗现象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原因还是在个人和家族关系的维系方面。如前所述,个人内心积压了许多因挫折引致的怨气之后,既然不能对自己人发泄,就只好集体找个外界的对象出气。今年发泄过了,等再过几年,累积到一定的强度,便需要再斗一次。所以,械斗具有一种“发泄积愤”的社会功能。由于家族规范着重于社会取向,容易造成个人有冤无处申、敢怒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械斗正好提供了一种周期性的发泄管道,使个人和家族的关系和谐不坠。

总之,权威性格的四个特点,皆有助于促进社会结构的稳定,基本上还是受社会取向态度的影响。不过,在这样一个重视集体与重视他人的环境中,相比之下个人往往会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人与自己的关系

在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里,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对个人本身虽较忽略,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与自己的关系仍然有其特点。关于人与自己的关系,可以分几个重点来谈。

第一,由于中国人特别重视社会与家族的集体功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相对地显得较不重要。换言之,传统的中国人并不注重个人的私生活。这个特质明显地表现在房屋结构上。中国式的传